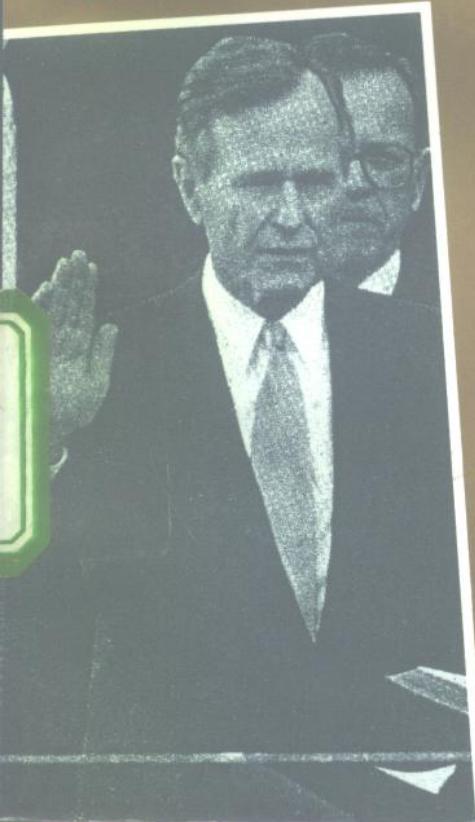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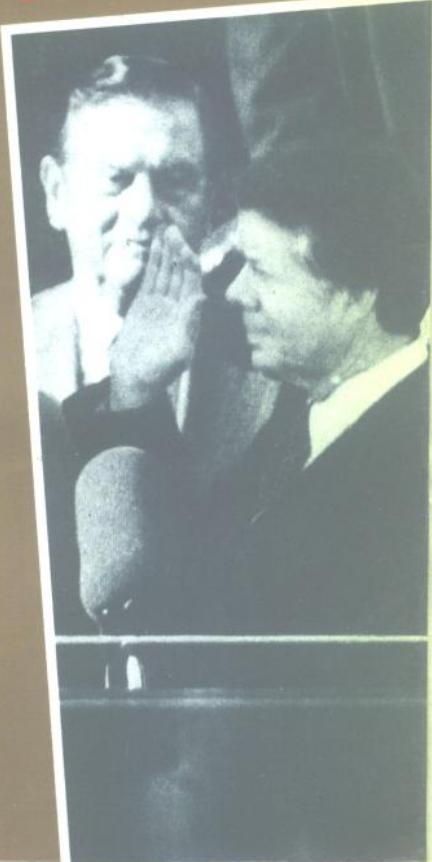
〔美〕R·G·哈切森 著
段琦 晓墉 译
晓炜 校



白宫中的上帝



GOD IN THE WHITE HOUSE



B928.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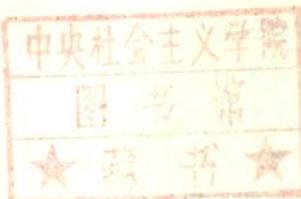
2

85391

GOD IN THE WHITE HOUSE

白宫中的上帝

[美] R. G. 哈切森 著
段琦 晓镛 译
晓炜 校



20003282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宋立道

责任校对：刘进珍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王丹丹

白宫中的上帝

Baigong Zhong De Shangdi

[美]R·G·哈切森 著

段琦 晓镛 译

晓炜 校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 插页 209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册

ISBN 7-5004-1156-1/B·239 定价：5.35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并研究了基督教为主流的宗教与白宫历届主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对美国宗教与政治关系的描述。作者揭示了上帝及上帝的诫命如何影响美国公众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在美国政府的行政操作中如何难以杜绝宗教的介入。

全书分12章，前面3章回顾了美国“政教分离”格局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开国者设想的“公民宗教”的深远含义；中间6章追溯了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的历史动荡与公众价值取向的相应变化，以及最终对白宫中政治行为的影响；最后两章，总结性地探讨了现实美国政治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冲击以及宗教伦理对一般意义上的美国文化的影响。

○ 译 者 序

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从思想文化背景看,既源于当初的美国创立者们如华盛顿、杰弗逊的自由主义的甚而自然神论的态度,更源于美国思想家们对近代英国、法国宗教史和政治革命史的一种批判性诠释和总结。从一开始就具有多元价值观特征的美国社会,尤其能够深刻理会并接受“凯撒的归于凯撒,上帝的归于上帝”这一政教区分标准。两百多年来,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毫无疑问是落在基督教传统上的。以摩西十诫为代表的道德箴言和普通美国人对上帝的深刻信仰,一直同美国式的创造的勇气和信心相辅而行。但在美国宗教本身,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私人之事,制度化的宗教——教会与等级结构中的神职人员——始终被客客气气地挡在国会、政府和高等法院之外。

然而,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直到 70 年代初,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动摇了并威胁着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二战以后给美国社会带来最深刻创伤的越南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种种并发症——大学校园内的抗议造反、各种反文化运动、吸毒、女权运动、性革

命——最终造成了传统道德的崩溃。道德危机当然不只存在于美国社会生活中,它也反映于立法、行政和司法各机构,反映于最高政治领袖——总统本人的身上。于是乎,便爆出了尼克松总统任上的水门丑闻,隔一任又出了里根总统任上的伊朗门事件,连带着又牵扯了一大批高级官员。总统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那些老老实实的纳税人寒心。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政治制度中缺了点什么。

《白宫中的上帝》一书的著作便在这一背景下来探索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作者认为,既然美国“公民宗教”大祭司——美国总统——理当成为正直虔诚的模范,那么一当他们的品行值得推敲的时候,基督教中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当然尤其是右翼)就免不了要插入来帮一把了,结果呢,在许多严重时刻,政教分离的原则便处在被冒犯的边缘。

《白宫中的上帝》一书共有 12 章。第 1 章叙述了美国总统个人信仰与其担任的公职的关系,具体谈到了里根与卡特各自的宗教信仰对其政策推行活动的影响。

第 2 章则分析美国各教派分裂的历史根源,描述了美国历史上各州的政教关系、清教徒与加尔文教的传统;公民宗教的形成以及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君子协定”。

第 3 章历数了从华盛顿到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诸总统的宗教观念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第 4 章称为“60 年代的巨变”,它叙述了美国社会中道德一致性的丧失,“自我实现”价值观的泛滥,福音派和基要派基督教的崛起及其政治上的积极表现。

第 5 章以尼克松和福特的宗教信仰态度来说明经典的“宗教政治互不混淆”模式已经结束。

第 6、7、8 这三章描绘了卡特总统所特有的南方浸礼会浓厚气息。说明了他为什么要用宗教原则来支撑他的和平、正义和人权的

主张。作者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卡特政治上的优柔寡断也可归因于他过份的宗教虔诚。

第9、10两章专门研究了里根总统与美国基督教右翼的密切关系，并指出宗教对司法部门的渗透。

第11、12两章探讨了当代美国政教关系，特别指出了基督教神职人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活动中的强烈政治介入，并预测了今后美国总统在政治和宗教关系上的平衡作用。

译 者

1992年元月2日

DH30/3408
目 录

译者序	(1)
鸣谢	(1)
前言	(4)
第1章	宗教和现代总统 (7)
第2章	宗教自由和公众信仰： 达成“君子协定” (17)
第3章	以往的总统们：国民宗 教的牧师 (45)
第4章	60年代的离心力：道德 一致性的丧失 (72)
第5章	转折点：尼克松到福 特 (96)
第6章	“执事”入主白宫	... (117)
第7章	重生的白宫 (133)
第8章	一位虔诚的总统任届 的风风雨雨 (157)
第9章	宗教右翼和罗纳德· 里根 (175)
第10章	里根任届的白宫上 帝 (202)
第11章	教会与国家及圆桌办 公室 (223)
第12章	结语：总统和公众 事务 (246)

○ 鸣 谢

本书的许多材料是得自同近来这几位总统的私人会见,来自同接近白宫椭圆办公室并能观察到福特、卡特和里根任上宗教地位的那些人以及同其他一些研究当前政教动向和事件的观察家们的个人交谈。

在此,对下列接待过我的每个人表达我的深切感谢:

吉米·卡特总统,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

卡尔·A·安德森先生,里根白宫公共联络(天主教联络)特别助理,

帕特里克·J·布坎南先生,尼克松白宫演讲稿撰写人、里根白宫通讯部主任,

阿尔伯图·R·科尔博士,罗德岛新港海军学院教授,关于道德和政府政策的作家,

米克尔·克罗马蒂先生,华盛顿道德与政府政策中心新教研究部主任,

唐纳德·霍德尔秘书,里根内务部行政秘书及霍德尔夫人,

卡罗尔·霍恩比女士,里根白宫公共联络(新教联络)特别助理,

约翰·A·小赫夫曼博士,尼克松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长老会的牧师,现任加州纽波特比奇圣安德鲁长老会教堂牧师,

黛安娜·尼佩斯女士,华盛顿宗教与民主协会代理会长,

罗伯特·L·马多克思博士,卡特白宫宗教联络特别助理,现任美国政教分离联合会执行理事,

唐·D·穆莫博士,里根总统在洛杉矶贝尔·埃尔(Bel Air)长老会教堂时的牧师,

理查德·约翰·纽豪斯牧师,纽约宗教与社会中心主任,

约瑟夫·L·鲍威尔先生,卡特白宫新闻秘书,

詹姆斯·M·沃尔博士,《基督教世纪》编辑,前伊利诺斯州卡特竞选组织主席,

弗兰克·R·沃尔夫,弗吉尼亚第十选区共和党议员。

没有对上述诸人的采访,本书不可能问世。

国会图书馆,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图书馆,亚历山德里亚的公共图书馆和弗吉尼亚神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及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协和神学院图书馆分部的人员,在我查询文献方面一直给予合作和帮助。

我特别要感谢纽约洛克菲勒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帮助,我也是其中的高级研究员。该中心工作人员对我在本书全部工作中给予鼓励和支持。尤其是中心主任理查德·约翰·纽豪斯牧师,他除了对其本身有关的事件接见我,发表了某些看法外,还就本书的主要问题与我一起花费了无数小时,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并逐章阅读本书底稿,给予我非常宝贵的评论和建议。

尤其要感谢的是埃尔哈特基金会,它为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资助;同时要感谢罗克福特协会为本书取得资助所作的努力。

我深深感谢我儿子理查德·G·哈切森三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他同我一起讨论概念，帮助我安排某些重要的采访，通读我的手稿并提出意见。我也感谢理查德·A·雷博士，他是我以往所写的书籍的出版者，而且对本书写作计划给予很大的鼓励，并且审阅了我的手稿。

最后，我要感谢麦克美伦出版公司的斯蒂芬·S·威尔伯恩编辑对我的鼓励，并在写作过程中给我提出建议和帮助。

当然，这许多人在给予我帮助的同时并不完全同意我的分析和结论，因此本书的全部责任应由我负担。

理查德·G·小哈切森

1987年11月

○ 前　　言

《**白宫**中的上帝》作为本书的书名是一种胆大妄为——有些人甚至会说这是一种亵渎。

但这里有一种含意是指近三届总统——福特、卡特和里根，都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把上帝带进白宫。尤其是随着吉米·卡特这位南方浸礼会信徒对“再生”运动和主日学的支持，以及随着罗纳德·里根有力地支持宗教右翼反对堕胎和积极推行公立学校祈祷计划，宗教以一种在美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方式影响着总统任届。

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宗教的几届总统”，如在本书中不时提到的那样，将不免发生误解，因为不管他们多么虔诚，宗教很明显地只是影响他们的诸因素中的一个。不过在基于政教分离的美国历史上，以前从来没有或者极少看到过宗教在这一“椭圆办公室”^①中起着这样显著的作用。为什么？当今这几位总统和我们的时代怎样会以这种惊人的方式把上帝

① 指白宫总统办公室。——译者

带进白宫？

宗教富有活力地进入我们时代的总统会议桌上决非偶然。本书认为这是 20 世纪后期多方面的道德危机所引起的反应，这些危机包括越战、水门事件和 60 年代动荡时期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它反映了美国人信仰的连续性，在历经历史全过程后，又回归到开国奠基者们的信仰中，即信奉国民道德植根于宗教之中。这是对传统的美国期望的新的表述：总统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将示范共同的基础性的对上帝的信仰，以团结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但矛盾的是，现代总统想用这种国民宗教的示范方法来填补道德空虚的能力，已为宗教集团自身的尖锐分化所削弱。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十分活跃的自由派新教中主流教派同当今政治化的宗教右翼，在每一个主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都各执一端。卡特和里根的总统任上都对这种分化作出过反应，并遭受到这种两极分化之苦。

本书首先回顾了历史上宗教与总统职权的关系，以及 60 年代到 70 年代初期的危机时代对传统宗教和道德的冲击，然后集中到水门事件以后几届总统任上宗教的地位。在此先对杰拉尔德·福特作一简单回顾，他具有鲜明而深厚的宗教感情，但又坚信政教不能混淆的传统观念。继而对福音派的吉米·卡特和罗纳德·里根任上的宗教地位和重要性作一些较详细的研究。接着回顾了宗教右翼的政治作用以及 1988 年前两位总统候选人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逊，他们反映了牧师谋求总统职位这一当代的现象。在最后几章中，探究了宗教在水门事件后的几届总统任职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意义：它对政教分离这一历史性原则的影响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含义。

今后，宗教是否还将在总统政治及政策制订上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还将留待以后观察。但它在当今的显著地位给美国政教史提供了饶有兴味的章节，并对当代美国文化作了意义深远的注释。

第 1 章

宗教和现代总统

“我们有责任去尝试建立政府，使其能体现上帝的意旨”

——吉米·卡特于 1976 年 6 月在普兰斯浸礼会堂对记者的谈话

1984 年 9 月，前总统吉米·卡特与其夫人罗莎琳以及来自他的佐治亚州教堂的 40 名志愿者，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在曼哈顿东侧低地翻新一所被遗弃的公寓楼。这个小组以野营方式吃住在梅特罗浸礼会教堂，为那座破损的公寓楼换掉腐烂了的梁柱和地板，把它变成 20 套低价单元楼房，交由该楼住户共同拥有。卡特于 1986 年在芝加哥，继而又于 1987 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参与同类的义举。所有这三项义举都由“人类住所”组织发起，该组织是以佐治亚州阿梅里克斯为基地的一个非赢利性基督教普世组织。通过志愿者义务劳动，该组织已为

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的穷人建起三千幢以上的低价住宅。

难道一位美国前总统就是这样的吗？睡在教堂地板的睡袋中？身着工作服，手持铁橇？为穷人提供住房？听起来似乎不可能，但却完全符合他的特点。正是这位一生读圣经、去教堂、教主日学的基督教平信徒把他的信仰付诸行动。同样，他在处理国务中也试图将其信仰付诸行动，这一点成为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一大特色。

几乎所有美国总统都自认为基督徒。有许多是真心实意的基督徒，有些还十分虔诚。但美国公众在此之前还没见过一位像吉米·卡特那样的白宫重生派教徒。他在白宫任职期间便在华盛顿的第一浸礼会教堂担任正式主日学教师，还向南朝鲜总统朴正熙和波兰共产党领袖爱德华·盖莱克作见证，而且每天他同妻子一起用西班牙语在白宫家庭祈祷中读圣经。

其它总统虽然避免采用像卡特那样明显的方式当众表明信仰，但在个人信仰上也是同样虔诚的。不过无人能够对此担保。以往的美国总统遵循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把个人信仰（不管这种个人信仰的性质是什么）同行使公职分离开来。

许多总统常去教堂。在华盛顿地区有许多教堂很自豪地标出“罗斯福座椅”或“林肯座椅”或“华盛顿座椅”。尼克松大肆张扬的白宫“东屋”礼拜把“教堂”搬进了白宫。美国总统在公开讲演的适当时刻，照例都要请求上帝。为民族事业请求神的祝福，在困难时刻给予引导。几乎没有一个总统不在宣誓就职的结束语中向这位全能的上帝祈福的。

但是大多数总统除了在典礼中发表感情洋溢的讲词，不定时的但却一本正经地去教堂礼拜外，他们的个人信仰被限制在似乎理应属于总统私生活活动范围内。事实上，政教分离的含义在多数美国人思想中（想来他们的总统也应如此）成为了禁止总统个人

的宗教信仰形诸政府政策的禁忌。

从一开始美国就一直声称信仰上帝，而它又是一个多种信仰的社会。近两百年来，随着政教分离政策的发展，针对宗教与公众生活的关系问题在国会和各级法院间时常发生争执。这些机构容纳了各种教派的代表，其本身就表现出宗教的多元化。人们通常都同意，总统是超乎这类争执的。按照美国本身的主导模式，总统常是一位传统的新教徒，属于国内许多教派中的一个。但他们的个人宗教信仰要同公职分离。总统是统一的象征。在这个宗教多元化社会中，他作为一国元首，是全体美国人的总统。他确实也具有重要的宗教作用，即一种能把所有的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共同信仰的象征性作用，也是一种社会所依存的有效价值观的象征性作用。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采纳了卢梭首先使用过的术语，为美国人历来赞同的这种宗教信仰的精义贴上了“美国公民宗教”的标签。不管这种共同信仰的标签是什么，总统一直是它的象征首领和代言人。政教的争端也就留给了国会和法院。

违反这种不成文协定的可能性是常会出现的。总统职位是在某种制度下的一个位置，如果个人积极实行其宗教的话，其宗教就会严重地影响政府。假设一位天主教徒、摩门教徒、犹太教徒或是一位分裂派新教教徒的总统，把他的官方行为置于个人信仰上，而这些信仰又不是多数人民所具有的，那么就会破坏这一多元社会中微妙的平衡。所以，按照不成文法，总统们在个人的教派宗教与公共职责之间划了一条相当明显的界线。第一位罗马天主教徒的总统约翰·F·肯尼迪为了当选，就明确允诺坚守这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卡特现象

吉米·卡特因为跨越了这条界线，既受到赞扬又受到诅咒。他正是这样一位总统：他的个人宗教信仰在他扮演公众角色中是一个主要因素。对世俗主义者和那些较为安静正规的宗教传统的人来说，他那一套浸礼会的福音派宣传实在表露得令人难受了。他公开谈论“再生”，由此为未来的总统职位追求者搞了一个争取福音派选票的再生的测试。这些追求者们在此之后几年中，或须表明自己具有类似的体验，或须对缺少这类体验作出解释。他不听任何劝告，坚持在他所属的华盛顿教堂内教主日学。他在各种场合都寻找机会作“见证”，不仅对非基督徒的外国贵宾们，而且对各类美国人，甚至新闻界。

新闻记者詹姆斯·伍顿是卡特任职期间《纽约时报》的驻白宫记者，他在 1988 年撰写的《冲击者》(Dasher)书中对此有所描述。这位作者在谈到“吉米·卡特的根基和崛起”时，显然对“他那毫不掩饰的宗教味”嗤之以鼻：

他似乎与它^①如此协调，动不动就要谈论它。他会说，他已经得到了“再生”。他解释说，耶稣已经“进入了并净化了他的心”。他也谈过“圣灵”、“因信称义，而不是靠善功”、“永远得救”、“永生的生命”，需要基督徒“每日为主作见证”，谈到他如何经常回到他住过的小村庄教主日学，怎样有一次曾为他的教会传教，又怎样在波士顿和宾夕法尼亚传播福音，所有这一

① 指宗教虔诚性。——译者